

戊戌變法簡史

湯志鈞 著



戊戌变法簡史

湯志鈞著

中華書局

戊戌变法簡史

湯志鈞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7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850×1168毫米 1/32·2 3/4印張·59,000字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7)0.32元

統一書号：11018·222 60.7京型

目 录

第一章	戊戌变法的社会历史条件.....	1
一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	1
二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的发展...	5
第二章	維新变法运动的掀起和高漲.....	12
一	維新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12
二	維新变法运动的掀起.....	15
三	維新变法运动的高漲.....	22
第三章	百日維新.....	26
一	新政的頒行及其内容.....	26
二	“百日維新”期間的新旧斗争和“戊戌政变”.....	35
第四章	戊戌变法的失敗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44
一	戊戌变法的失敗原因.....	44
二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49
附 录		58
一	戊戌变法运动大事記.....	58
二	戊戌变法論文索引.....	73

第一章 戊戌变法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在逼迫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之后，就和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历次反抗斗争。第二次鴉片战争失败以后，一部分军阀、官僚、买办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赞助”，兴办“洋务”，以维护封建专制政体。但经过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这时，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特别是甲午战后的再一次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更加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维新运动，就在甲午战后迅速掀起。

一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在华势力益加强大。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急于把剩余资本输出到半殖民地的中国。因此，在甲午战后的数年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了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并且争先地向中国投资。

根据“马关条约”，中国须对日本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第一年即应付一万万两。“马关条约”签订后六天，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割取我辽东半岛，迫之交还我国，但又须支付还辽的“酬报费”库平银三千万两给日本。

在甲午战争以前，清朝的财政，原已十分困难，当时要在国内自行筹划这笔庞大款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为了缴付此项赔款，清政府只好向帝国主义国家筹借外债。清朝政府既急于借债，帝国主义者又急于放债，于是分别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英法洋款”、一八九六年签订了“英德洋款”、一八九八年又签订了“续借英德洋款”。以上三次大借款，共计合银三万万两，加上利息，共六万万两以上。

帝国主义国家以这三次政治性的大借款为契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关税的控制，又通过铁路、开矿等项贷款或投资，不只掠夺了铁路、开矿的权利，而且攫取了路矿附近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

帝国主义国家攫取中国的铁路建筑权，是在甲午战后（一八九五年），依据“中法商务条款”，法国索得展筑越南铁路入中国境内的让予权而开其端的，接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在中国争夺铁路建筑权。总计在甲午战后的四年中（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八年），各国在华获得之铁路权利计有：英国获得广九铁路、北宁铁路、京沪铁路、沪杭甬铁路之借款管理经营权，浦信铁路之借款权，道清铁路之建筑权（均为一八九八年）；法国获得龙州铁路之建筑权（一八九六年），平汉铁路之借款权（一八九七年），滇越铁路、赤安铁路、南宁铁路之建筑权（一八九八年）；帝俄获得中东铁路之合办权（一八九六年），平汉铁路之借款管理经营权（一八九七年），中东路南满支线的合办权（一八九八年），正太铁路之借款管理经营权（一八九八年）；德国获得胶济铁路之建筑权（一八九八年）。帝国主义通过这些铁路的建筑，又进一步霸占“租借地”，如德租胶州湾、法租广州湾、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卫等，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又把铁路所在地区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

城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一部份屬英），福建屬日。他們不僅利用這些鐵路來傾銷他們的商品，和控制沿海地區的農業生產，便於掠奪廉價的原料，因而摧殘了沿路區域的中國工商業，並且獲得了礦山的投資開採權。如德國在獲得膠濟鐵路的建築權的同時（一八九八年），攫取了沿綫三十里之採礦權；英國在獲得北寧鐵路之借款管理經營權時（一八九八年），也取得了開灤煤礦的開採權，以進一步的掠奪中國的資源。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又在中國紛紛設立工廠。根據“馬關條約”第六款第四項之規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沽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併辦理；至應享優待豁免，亦莫不相同。”次年（一八九六年），“中日公立文牒”第三款又規定：“日本政府允許中國政府任便酌量課機器貨物稅餉，但其稅餉不得比中國臣民所納加多，或有殊異。”這樣，帝國主義就可以在中國開設工廠，並且這些工廠又取得與華資工廠及洋貨之同等待遇。其他帝國主義也都以“最惠國條款”在中國取得此項權利，紛紛在中國設立工廠。一八九五年，就出現了英國資本的怡和、老公茂，美國資本的鴻源，德國資本的瑞記，日本資本的東華等外國資本的紗廠；英資經營的增裕面粉公司也於一八九六年在中國創立。外國工廠在中國的設立，一方面把中國變成它們工業品的獨占市場；另一方面，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他們的需要，使中國的殖民地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

此外，帝國主義國家又在上海設立銀行，新增的銀行分行有：英國的有利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英國為了在中國進行鐵路投資，輸出

資本，一八九八年將匯豐銀行與怡和洋行合組為中英銀公司，其任務是：掌握中國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國的財政；投資於鐵路和礦山；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幣，操縱金融，獨占外匯。這些銀行變成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在中國的大本營，控制了中國的貿易和金融。

如上所述，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從對中國的商品輸出進而對中國實行資本輸出；清政府也因甲午戰後的巨額賠款而大借外債，並于對歐洲列強的負債的同時又使中國變成列強的投資地。帝國主義又在中國開設工廠，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中國民族工業因而受到嚴重的壓迫，直接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各國對華的貿易數字，亦較過去激增，並在這四年中增長得特別迅速。根據中國海關公布數字：一八九四年從事對華貿易的美國商船為一〇七艘，共一二九，一二七噸，貿易總值為二，八八九，〇六〇海關兩；至一八九八年美國商船即增為七四三艘，共二三九，一五二噸，貿易總值為四，三二七，五三〇海關兩。也就是在這四、五年間，以美國為例，商船數增加了七倍，貨運噸數增加了近一倍，貿易總值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又據統計：英國的對華貿易額在一八九六年達三九，二九一，〇〇〇磅，比一八九五年的二七，二五〇，〇〇〇磅，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帝國主義國家又通過借款給清朝政府以及在中國開設銀行，從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帝國主義國家還強占“租借地”，各自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這種情況，正如陳伯達同志在《從封建的中國到半殖民地的中國》一文中所指出的：“和資本主義變成帝國主義差不多同時，中國近代史，經過中日戰爭，才完全形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狀態。”“以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失敗為契機，帝國主義……把中國瓜分為各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作為自己獨占的市場，獨占的原料地，獨占的投資地，也即是把中國完全變成各帝國主義統治

(一方面是分別統治，另方面又是共同統治)下的真正半殖民地。”

二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的发展

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六页。）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就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们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此，鸦片战后的数十年中，不仅工場手工业有新的发展，大机器工业也开始在中国出现。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和清朝政府所面临的战后财政困难，封建统治阶级在勒索商民“捐输”的同时，也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让出一点道路，不得不放弃奕訢、李鸿章等所规定的禁止民间使用机器的惯例，而于一八九六年二月依照御史王鹏运的奏议，通飭各省督撫分別在省会筹設商务局，“官为設局，一切仍听商办，……由各商公举一般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紳商，派充局董，駐局办事。”一八九七年三月，又准給事中褚成博奏，明令各省“官紳量力附股，每届年底，将章程款目，由总厂詳刊送閱，如有弊混，不論何人，皆准赴厂办詰，并許附股之人赴京呈控。”这说明了尚在幼稚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此时已开始反抗清朝政府对新式工业的官办壟断政策，并从而取得了“准各省广

开民厂”的地位。甲午战后，新式工业逐步从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的桎梏中得到解放，这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排挤下，这种发展仍然是很微弱的。

甲午战后，在中国新設的厂矿，基本上属于民族资本性质的主要企业，有如下表：

开办年份	地 址	厂 名	备 注
一八九五	上 海	裕 晉 紗 厂	資本二七九,七〇〇元，初設紗錠一五,〇〇〇枚。一八九六年改組，称协隆紡織局，紗錠增至二〇,三〇〇枚。
	上 海	大 純 紗 厂	資本二七九,七〇〇元，初設紗錠二〇,三九二枚。
一八九六	河 北	通 兴 煤 矿	資本六九九,三〇一元，旋与美商施穆合办。
一八九七	无 錫	业 勤 紗 厂	資本三三五,七〇〇元，初开时紗錠一〇,一九二枚。
	苏 州	苏 綸 紗 厂	資本八三九,二〇〇元，系官商合办，紗錠初为一八,二〇〇枚。
	杭 州	通益公紗厂	資本五三三,三〇〇元，初开时紗錠一五,〇〇〇枚。
一八九八	上 海	裕 通 紗 厂	資本二〇九,八〇〇元，有紗錠一八,二〇〇枚。
	河 北	井 陘 煤 矿	資本六九九,三〇一元，旋与德商汉納根合办。

資料来源：严中平：《中国棉紡織史稿》；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

由上表可以知道，这些工业，大体属于商办一类，并且投資在二十万元以上。这說明在甲午战后，有一些地主、官僚、富商向新式工业进行投資。在这些企业中，以紡織工业为最有发展，因为紡織工业成本較輕，利潤較优。据統計，华商紗厂一八九五——一八

九八年間的紗錠設備和地域分布情況如下：

年 份	上 海	江浙內地區	其他各地	全 國
一八九五	一三三,九七二	—	四〇,五九二	一七四,五六四
一八九六	一三三,九七二	一一,〇四八	四〇,五九二	一八五,六一二
一八九七	一三九,二七二	五四,四四〇	四〇,五九二	二三四,三〇四
一八九八	一六一,〇八四	五四,四四〇	九〇,六五六	三〇六,一八〇

資料來源：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到華商紗廠在甲午戰後的四年中，全國紗錠總數是逐年增長的：一八九六年的全國華商紗錠總數比一八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六點三；一八九七年比一八九六年增加百分之二五點七；一八九八年比一八九七年增加百分之三十點五，比一八九五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左右。

由上述棉紡工業的例子裡，可以看出中日甲午戰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是獲得了初步的發展的。

但是，這只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發生變化的一個方面，“還有和這個變化同時存在而阻礙這個變化的另一個方面，這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九八頁）。

上面我們雖已曾揭露了一些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罪行，從而指出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初步發展道路上所遭遇的嚴重障礙，現在還得將甲午戰後國內外反動派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必要的敘述。

首先，從當時輸入洋貨和國貨的負稅輕重來看：根據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所附“通商善後條約”的規定，洋貨輸入中國時，納進口稅百分之五，自通商口岸運至內地銷售，只須再納百分之二點五的子口稅，不必再納其他內地稅。而國貨則仍須“逢關（常關）納稅，

过卡抽厘”。因此，在通商口岸制造的国货运至内地销售，其税金的负担，往往反比洋货要重。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各项特权，随着口岸的增辟而日益减低其子口税之负担，“馴至洋货只有正税，几无复子口税”（張謇：《拟請提議照約速定裁厘加稅請秘密會議文》，見《張季子九录》《政聞录》卷三）。即正税亦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如扣布每匹只納稅四分，寬三十、長四十碼的洋布，每匹也仅納稅錢余或八分。帝国主义国家凭借政治上的特权，一方面既加紧向中国市場傾銷他們的过剩商品，另一方面又在中国直接經營厂矿企业，掠取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这样就严重摧殘了中国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其次，如前所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根据“馬关条約”第六款第四項的規定，日本帝国主义既可在华開設工厂，且其在华工厂又享有与华資工厂及洋貨的同等待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都以“最惠国条款”在中国享受此項权利，紛紛在中国設立工厂。在帝国主义直接設立工厂的排挤下，“上海华商有将自立紡紗、繅絲等厂售与洋人，免亏血本者”（朱寿朋：《光緒朝东华續录》卷一三九“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奏”引“黃恩永片”），以致“华商……已成之厂，获利无多；未成之厂，集資非易。洋商見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計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按指一八九六年——引者）江、浙、湖北等省，繅絲、紡紗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推押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攬之势”（同上“張之洞奏”）。这里清楚地說明，中国民族資本主义工业，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而有些企业，則被帝国主义吞并挤垮。例如甲午战后在上海新設的裕晋紗厂、大純紗厂，沒有几年，即因积欠帝国主义銀行透支款和受帝国主义工厂的排挤，被迫拍卖或改組，最后均为日商买去，这就是外国工厂摧殘中国工厂的一个具体例証。

再次，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除掉在中国投資設厂外，并投

資建筑铁路、盜窃矿藏。发展工业“非鉄不成，非煤不济”的資源，既大部为帝国主义所掠夺，交通运输事业又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更給中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最后，还須指出，清朝政府虽然在甲午战后被追給中国民族工业让出了一些出路，但仍沒有給民族工业以真正的保障。“洋务运动”是在甲午战中彻底破产了，而洋务派官僚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怀等，則更加向帝国主义国家靠攏了，日益买办化了。他們一方面出卖中国的主权，同时，还想使正在发展的自由資本成为自己的附庸。例如甲午战后的杭州設立的通益公紗厂，为李鴻章所操纵。在苏州設立的苏綸紗厂，原是苏州商务局所集商股創办的，按照清朝政府的命令，商务局只是“官为設局，一切仍听商办”，可是初建人是在籍的前国子監祭酒陆潤庠，开車后第三年（一八九八年），这个厂也就因而出租，承租人是候选郎中祝承桂，并举在籍的广东候补知府吳景萱为总董，另由翰林院修撰費念慈、內閣中书潘祖謙为理事，遇事則由江苏藩司会同商务局督察商办。这样，这个厂就实际上为一群戴着各色官銜的买办官僚所把持。在出租时，契約虽然規定了不論营业損益，必付股东官利的条款；而实际上，股东不仅得不到利息，就是对企业的經營也根本无法过問。

这些都說明了中国資本主义在甲午战后虽則曾經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是尽力加以抑制和阻止的；也說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想真正发展民族工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使中国面临着瓜分危險，而民族工业也在艰难困苦之中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資本主义，就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最

迫切的問題。

这时,中国工人階級还比較幼稚,是一个自在的階級,還沒登上政治舞台。农民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已經过去,农民斗争的再起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还在后面。于是,寻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责任,不得不暂时地由资产阶级維新派这个不成熟的力量承担起来。

为什么說资产阶级維新派当时只是不成熟的力量呢?因为它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后,投資开设资本主义厂矿的,是一部份商人、地主和官僚。据統計,在甲午战后四、五年間,以煤矿、紗厂为例,这些企业的创办人在创办时的身份及其資本关系,有如下表:

开工年份	厂 矿 名	資 本(元)	創 办 人	附 注
一八九六	河北門头沟 興煤矿	六九九,三〇一	段益三	旋与美商施德 合办
一八九七	福建义記公司	六〇,〇〇〇	陈適驥(盐商)	
	无錫业勤紗厂	三三五,七〇〇	楊宗濂(长芦 盐运使)	
	杭州通益公紗 厂	五三三,三〇〇	高凤德(补用 知府)	与李鴻章有关 系,資本大部 出自李家
	苏州苏綸紗厂	八三九,二〇〇	陆潤庠(国子 监祭酒)	苏州商务局筹 款
一八九八	河北井陘煤矿	六九九,三〇一	張凤起(諸生)	旋与德商汉納 根合办
	上海裕通紗厂	二〇九,八〇〇	朱幼鴻(浙江 候補道朱鴻度 之子)	

資料来源:汪敬虞,李一誠:《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煤矿》《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紡紗厂》二表;載《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上表列有官职的创办人中，有的是官僚，有的是富商，也有一些（候补官）只是一个官衔，他们实际上是捐官买爵的大商人或地主。这个事实，正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七页）。

这些投资经营近代工业的，由地主、官僚、商人转化来的企业主，在他们出现的时候，其发展即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强大的经济势力以及外国侵略者所羽翼的官僚买办的势力的阻碍。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是有矛盾的。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来说，他们看到通过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所以投资于新式企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封建剥削为其利益的根本所在，因而又并不希望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这种经济上的双重性，也就决定了他们政治上的双重性：由于他们投资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摧残，因而渴望本身参预政权，借以维护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可是他们又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极端害怕人民群众起来根本推翻封建主义，因而又只希望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就是适应这样的阶级要求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

第二章 維新变法运动的掀起和高漲

中国的維新思想，即要求中国由封建社会改变为資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是伴随着外国資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紧和清朝封建专制危机的不断加深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維新思想之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則是中日甲午战后，以康有为领导的“公車上书”为起点。戊戌变法前維新思想的发展，是从鴉片战争以后至戊戌变法前五十余年間中国社会經濟的反映；同时，它也曾反轉来給中国的社会經濟以影响。作为这种維新思想发展的高峰，并且成为一个政治改良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一 維新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外国資本主义侵入开始的。鴉片战争前，中国是封建社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的社会經濟結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在一些比較开明的汉族地主階級中間因而产生了抵抗外国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在与外国人实际接触中，逐漸改变了一些旧思想，主張仿制外国新式武器，打击資本主义侵略者。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則借經今文学的“微言大义”，譏切朝政，主張向西洋学

习。他們是中国維新思想的先驅者。

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在开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英、美、法三国侵略者联合起来，于一八五六年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在从清政府手中得到了很多經濟上、政治上的特权之后，就与腐朽的清朝封建势力結成反革命同盟，共同絞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部分軍閥、官僚依靠帝国主义兴办“洋务”。当洋务派官僚正以“富强”自夸时，跟中国邻近的并跟中国长期友好的国家如緬甸，逐渐变为英国的殖民地；日本攫占了琉球；英、俄侵入中国的边疆——云南、新疆、西藏。在外国資本主义进一步侵略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逐渐有了投資新式工业，学习西方資本主义生产技术的要求；同时，洋务派中也分化出了一些初步具有資產阶级經濟要求的改良思想的人物。前者可以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年）为代表，他提出学习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之术”，“始則师而法之，继則比而齐之，終則駕而上之”（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制洋器議》），并要求机器、輪船和枪炮等能够作到“自造、自修、自用”。后者可以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年）和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〇〇年）为代表，他們主張发展民間工商业，提出“使出口之貨多”，“使进口貨少”，“开矿山固有之財”等經濟要求。

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以后，由于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給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刺激；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这时，受过西方資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識分子，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資產阶级政治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

郑观应在一八六二年就出版了《救时揭要》（后改名为《易言》），后于一八九二年增訂为《盛世危言》一书，主張采用外国机